

《尚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代表着最早的中国历史。《尚书》通过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重大历史事件的语诰、誓诰等，记录了三代历史更迭、社会经济结构演变，是记载中国上古最重要的文献。《尚书》叙事自尧舜至夏商周，跨越2000余年，是西周至战国时期人们追述华夏历史的珍贵史料汇编，其中《尧典》《皋陶谟》《禹贡》《盘庚》等篇记载距今4000年的大洪水和治水活动，客观呈现出水利与中华文明起源的渊源，水利对中华文化基因的深刻影响。

大洪水传说与尧帝时期的治水

《尧典》是《尚书》的首篇，主要涉及尧帝时期的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这一篇最重要的记载是史前大洪水，以及尧帝派鲧治理洪水的过程：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金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这段对话译成现代语体：（尧）帝说：“啊！四岳，你们看滔滔洪水包围山岳，漫过丘陵，哪里还有家园！百姓忧困不堪，谁能治水？”群臣都推举鲧。尧帝说：“（鲧）怠戾，常逆天行事，危害族人。”四岳说：“（鲧）有奇才，试试吧。”尧帝遂命鲧治水。鲧治九年，而无成效。

这是史前大洪水的记载。气象史、天文史、地学史的研究证实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世界很多地区包括中国在内，都发生过世纪性的大洪水。在中国，这场洪水涉及的范围主要是黄淮海平原，可能还有长江上游岷江流域以及浙东平原。20世纪40年代以来河南二里头、四川广汉三星堆、浙江良渚等考古遗址发现，在这个区域内的氏族部落和文化遗存可能受到了洪水的危害甚至遭到瞬间毁灭。地处黄河下游的炎黄部族是大洪水后幸存的部落，他们在部族首领的带领下走出了灾害，他们的重生之地就成为华夏文明的诞生之地。这条史料显示出在尧的时代，已经遭遇了大洪水，几乎濒临灭族的危机。自尧帝始华夏部族已经与洪水抗争，鲧受命治水而没有成功。

《尚书》中的治水精神与水利文明

□ 牛志奇

《尚书》后的《史记·五帝本纪》这样记载大洪水和尧的治水：“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传说鲧用的是共工氏筑堤挡水的办法，治水九年而无功。鲧治水是后来大禹治水的先声。禹反其道而行之，疏导河道，使水有归宿，最终治水成功而华夏有九州。鲧和禹的治水活动其实是华夏部族战胜洪水，也征服中原各族，最终走向统一国家的历史进程，治水也是国家形成的最重要因素。

设水官与舜帝的华夏疆域

传说尧帝禅让，尔后舜帝就位。舜时治水成功而定十二州。《尧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是说水落州分，华夏部族得以辟疆十二州，并封土十二山以祭祀。《尧典》记载了舜帝时代禹为司空，受命治水的事。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金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这一段是说舜帝时以禹治水有功，命禹任司空之职，并总领百官。

禹浚九河，治水成功，舜帝让位于禹。华夏统一中原诸族，划定十二州封侯以治，以祭山川为国之大事。华夏的中国由此产生。这就是传说的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的时期。《尧典》中记载的舜帝在政治活动中的谈话，使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舜帝政治活动的基本情况，治水的记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他的治国思想和措施，说明治水在最初的国家形态下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部族领袖的重要国事，也是其进行政治、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水利这个悠久的公共事业从一开始就与治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治水史。



《尧典》记载舜帝封禹为司空之职，让其治水。从这个记载看，这也是水官职制度的雏形阶段，后世予以传承。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西周时设置司空，与六卿相当，与司马、司徒、司士、司徒并称五官，掌水利、营建之事。《管子·度地》中桓公问备五害之道，管子对曰：“请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汉书·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又衡官、水司空、都水、农仓。”由此可见，舜帝时设水官，开水官职制度之先，对中国古代的水官职制度和水利行政管理体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治水与禹的治国

《皋陶谟》是《尚书》的第二篇，主要是记录君臣谋议国事的重要文献，皋陶，是舜帝的大臣，掌管刑法

狱讼。此篇主要记载舜和大禹、皋陶的对话，主要讨论以德治国和治国安民的道理。

《皋陶谟》：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洫距川；暨稷播奏庶粮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皋陶曰：“俞！师汝昌言。”这是讲大禹治水的过程。大禹治水中发明创造了工具，得以开路架桥，导河至海。他与后稷兴农耕，使老百姓得以有食物，有居所。百姓安定而国家安定。这段大禹的传说折射出大洪水之后，华夏民族农耕兴起的早期历史，反映了治水与国家形成的密切关系。

《皋陶谟》流露出深刻而正宗的儒家思想，其中很多句子被《论语》《孟子》所袭用。儒家思想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其仁爱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大禹在

此的回答与对话，不仅展示他治水的坚定信念，也体现了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的思想本源。从文化层面上看待大禹治水的功绩，更多的是从治国安邦的意义上来认识，才会有“万邦作乂”的天下太平之朗朗气象。

地理中国形成：大禹治水的功绩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是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讲述了大禹治理洪水、划分九州、记载各地山川脉络、土壤等级、物产分布等情况，以及各州贡赋的品种、所经的途径等。全书分5部分：一是九州。叙述上古时期划分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扼要地描述了各州的地理概况。二是导山。分九州山脉为四列，叙述主要山脉的名称、分布特点及治理情形，并说明导山的目的是为了治水。三是导水。叙述9条主要河流和水系的名称、源流、分布特征，以及疏导的情形。四是水功。总括九州水土经过治理以后，河川皆与四海相通，再无壅塞溃决之患。五是五服。叙述在国力所及范围，以京都为中心，由近及远，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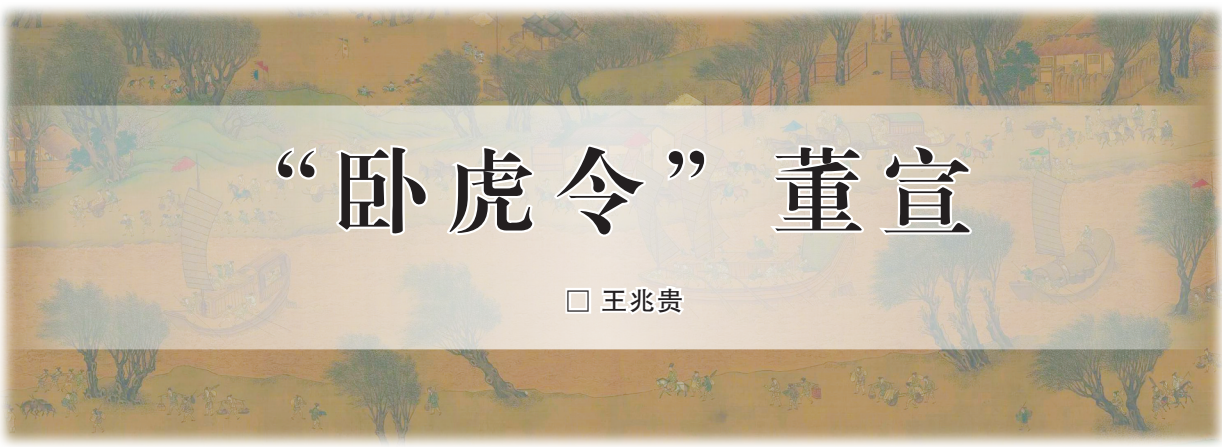
划分九州：《禹贡》开篇“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划分九州疆界，随着山势斩木通道，确定各州的高山大河。如：“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这段是讲：壶口治理好了，接着就治理梁山和岐山。太原治理好了以后，又治理到大岳山。怀庆一带的治理取得了成效，又到了横漳水一带。这个州的土是含盐的白壤，那里的赋税是第一等，也夹杂着第二等，那里的田地是第五等。恒水、卫水已经疏浚通畅了，大陆泽周围的土地也可以耕种了。东北的岛夷

民族进贡鸟兽皮毛，他们是循辽河—渤海—黄河这样一条水路入贡；沿着辽东湾西岸向南航行，循着拐角处的碣石，据以右转，再向西进入黄河。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黄河口位置在渤海湾碣石山附近，这就等于从文献角度给4000年前的“禹河”定了位。《禹贡》把冀州的山川脉络、河流湖泊的治理、土壤等级、物产分布以及东北的岛夷民族贡赋的品种、所经的途径一一说明了。

导水：“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是讲：淮河，自桐柏山开始，东流汇合泗水和沂水，向东流入大海。

治水功绩：“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是讲：九州疏导工程都已完工，四方境内都可以安居了，九州山脉都斩木通道了，九州的河流都已全线疏通了，九州的湖泽都修筑了堤防，四海之内进贡的道路都畅通无阻了，四海之内统一一致了。

这是大禹治水活动的最早记载，把大禹治水的过程记录下来，疏通了九州河川，筑起了九州大泽的堤坝，使国家得到了治理，老百姓得到了安定的生活。大禹治水无论从政治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对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大禹治水是中华文明起源期的历史记忆，它不仅代表了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治水活动，更是治水作为国家职能的开始，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秦建郡县制后，政府将水利纳入国家职能范围，其后一脉相承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始终。大禹治水在以后的史籍中被频繁引用，如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和《河渠书》中也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史料，使得大禹这一形象深入人心并传之后世。大禹体现的是勤劳勇敢、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象征着中国人的力量，也象征着中国人的智慧，几千年来，为我们的人民所秉承，世代相传。大禹治水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源头和象征。



“卧虎令”董宣

□ 王兆贵

有一出地方戏叫《卧虎令》，赞扬的是汉代廉吏不畏强权、秉公执法的故事。这个被百姓称作“卧虎”的角儿，历史上确有其人，他的名字叫董宣。据《后汉书》记载：董宣，字少平，陈留郡圉地（今河南杞县圉镇）人。他曾先后就职北海、江夏，后因朝廷特诏，年届古稀调任京都。东汉初年，经济虽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社会秩序还不安宁。当时的京都洛阳，由于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聚居的中心，权贵子弟骄纵跋扈、家臣奴仆横行滋事现象时有发生，整治难度格外大些。朝廷接连换了几任洛阳令，局面还是控制不住。无奈，光武帝刘秀只好任命年已69岁的董宣做洛阳令。

年届古稀的旧臣复出任洛阳令，且是皇帝钦点，想来必有过人之处。当年，江夏大盗夏喜等扰乱当地社会治安，朝廷命董宣任江夏太守。到了江夏地界，董宣就传信给夏喜等人说，朝廷认为我能擒贼，所以让我担任此职。现在，我派兵马部署在本郡边境，檄文到达之日，望你们慎重考虑一下自我保全事宜吧。夏喜等人对董宣的来头有所风闻，不免害怕起来。于是乎，降顺的降顺，散伙的散伙。就这样，一纸文书，兵不血刃，便把这帮盗匪给瓦解了。

董宣任北海郡期间，有个叫公孙丹的大户造房子，听风水先生

说宅有凶兆，入住后要死人。公孙丹就让儿子杀了一个路人，放进新居替死消灾。董宣得知后，便将公孙丹父子处决了。公孙丹的族人亲党30多人，拿着兵器到府衙闹事。因公孙丹曾依附过王莽，又怀疑他们串通海盗，董宣就把这些人抓进大牢，指使部属水丘岑把他们通通杀了。青州刺史认为董宣杀人过滥，就向朝廷奏了一本，董宣被召到廷尉府审讯。在狱中，董宣早晚吟诵诗经，面无愁容。临刑前，官吏备酒食送他，董宣厉色说，我平生不曾吃过别人的饭，何况将死！说罢，登上囚车，从容而去。当时，与董宣同被处决的有9个犯人，轮到董宣受刑时，光武帝遣特使快马赶到，特赦董宣缓刑，暂且返回监狱。接着，又派使者诘问公孙氏一案详情，董宣据实作答，并说明水丘岑杀人受命于己，要杀就把我杀了，请求免除水丘岑刑罚。使者将原奏上奏天听，皇帝下诏董宣贬职转任宣怀令，并令青州官员不再追究水丘岑的罪责。

光武帝特诏董宣为洛阳令后，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刘黄的府上，有个苍头（家奴）恃无恐，大白天杀人，因躲在公主家里，官吏拿他不得。及至公主出行，让这个奴仆陪乘。董宣便在夏门亭等候。待公主的车驾仪卫到达，董宣便拦住公主的车马，以刀划地，大声数落公主的过失，叱令那个杀人的家奴下车就死。

湖阳公主气坏了，立马回宫向皇帝诉说此事。皇帝大怒，召来董宣，意欲处死。董宣叩头说，请听我一句话再死。皇帝问，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董宣答，陛下凭圣德中兴，却放纵奴仆杀害无辜，将何以治理天下呢？我不须捶杖毙之，请求自行了断。遂头撞楹柱，血流满面。皇帝急令宦官拉住，让他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不从，便强按他的脖子。董宣两手撑地，始终不肯低头。公主对皇帝说，你当初做平民时，私藏逃亡犯人，差吏尚且不敢上门搜捕，如今贵为天子，连一个县令都治不了吗？皇帝笑着说，正因为做了天子，才不能像过去做平民那样行事啊。于是敕令把这位“硬脖子”县令放了，并赐钱30万，董宣全部赏给了部属。从此，董宣放胆打击横行不法之徒，豪强莫不震慑。京城人都称他为“卧虎”，有歌谣赞颂他说“枹鼓不鸣董少平”，意思是，董宣主政京都后，不再有横行不法、欺压百姓的案件发生，也就不需要击鼓鸣冤了。

董宣在洛阳为官五载，74岁那年死在任上。皇帝诏令使者前往吊慰，只见遗体上盖着布被，老嫠、孩子相对而哭。家中只有大麦数斛，旧车一辆。皇帝伤感地说，董宣如此廉洁，直到他死了我才知道。因董宣的俸禄曾为二千石，皇帝就赐他绿色丝带的印绶，并按大夫的礼仪规格安葬。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次年5月27日中英双方签订了《广州和约》，但英国内阁贪心不足，嫌所掠过少，于是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扩大侵华战争。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1841年10月1日），英军第二次攻陷定海，守卫定海的葛云飞、王锡鹏、郑国鸿三总兵率部浴血奋战而亡。二十六日，英军攻占镇海，总督裕谦、总兵谢朝恩战死。二十九日，英军舰舰至宁波，宁波不战而降，慈溪、余姚官兵纷纷逃命。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四日（1842年3月15日），浙江慈溪的大宝山，战云密布，这一天发生的战争是鸦片战争时期最激烈的战斗之一。此时面对英国侵略者，在大宝山指挥作战的是时年64岁的浙江金华协副将朱贵。

朱贵（1779—1842年），字黼堂，又字君山，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人，祖籍江南上元（今江苏南京）。出身于行伍世家，曾祖顺治年间随军流寓河州；祖父朱仲阵亡，父亲朱显光负伤退役。其父以朱氏两代一死一伤却未能建报国功勋为遗憾。朱贵17岁，由武生入伍循化营。嘉庆五年（1800年）调赴蜀营，“勇名冠一军”。由榆林镇标外委，累官至原州营守备。道光六年（1826年），以军功升破口营都司。后历任游击、参将、晋宁协副将等职。朱贵平常在部队的训练中要求很高，自身以勇武著称，所带领的固原子弟兵500余人军纪严明，骁勇善战，被称为“最为节制之师”。朱贵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身先士卒，临危不惧，在士兵中有极高的威望。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国侵略军队再度侵占定海。八月，浙江金华协副将重祥战死。战况紧急，清政府简放朱贵调补。时年已62岁高龄的朱贵克服万难，“益慷慨自任，率仲子昭南，季子共南抵浙”。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四日，朱贵率数百陕甘子弟兵不惧艰险，逆流而上，清晨在慈溪城西的大宝山与英军激战。战斗异常惨烈，《清史稿·朱

贵传》记载：“贵腹背受敌，怒马斫阵，中枪马倒，跃起夺敌矛奋，伤要害，乃路。子武生昭南，以身障父，同时阵亡。”

朱贵部孤军奋战，援兵不至，腹背受敌。他激励士卒，奋勇死战，守卫官兵虽处危境，又“饥不得食”，仍“誓死格斗”。朱贵右臂被炮火击断，仍用左臂擎旗，指挥部下与英军肉搏，不幸咽喉中弹，堕马身亡。

朱贵战死后，其子昭南擎旗继续，连杀数名英军，数处负伤，力战而亡。其尸和朱贵尸“相去丈许”。季子共南，战斗中身负三处伤，死而复苏，目睹父兄阵亡，悲痛中脱衣为父兄的尸体掩盖，组织仅剩下的士兵浴血突围。

朱贵父子虽双双阵亡，但战旗不倒，守军犹力战不退，几乎全部阵亡。因为朱贵“平时号令严肃，旗不去，无敢退者”。直至英军炮火击中旗杆，军旗折断，余部才突出重围，退出战斗。

大宝山一战，朱贵父子所部几乎全军覆没，但也给英军以沉重打击，伤亡惨重。夏燮在《中西纪事》中记载英军：“载其尸累日不尽，痛哭惊悸，相谓曰：自内犯以来，未有受创若此之重者。”

林则徐撰句“忠规孝矩”，高度评价朱贵父子。在强敌入侵时，朱贵父子从甘肃千里迢迢来到浙江，誓死抵抗英军侵略，朱昭南，追随父亲，在其父战死之际，接过军旗，力战不退，英勇捐躯，忠孝两全。

朱贵虽是武将，但也是一个饱学之士，今天兰州碑林中还保留有朱贵手书的家训石碑：“欲增福寿惟善行，要好儿孙须读书。”落款为黼堂。字为草书，初一看，潇洒飘逸，细细品味，中规中矩又遒劲有力，字如其人，处处透着刚正之气。朱贵将军在督促子孙练武的同时强调读书，通过读书来明礼，开阔视野，提高自身的修养和能力。

朱氏家族世代英烈，人才辈出。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为国捐躯。朱贵的这两句家训是其良好家风的集

誓死抗击英军的朱贵父子

□ 陈 亮

中体现，正是由于这种优秀家风的力量，将个人小家和国家民族紧密联系，才使得朱氏父子在战场上将生死置之度外而英勇杀敌。

慈溪百姓感念朱贵父子及其同时牺牲的官兵，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建祠庙，在慈溪西门外，名“慈郭庙”。今天已是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朱贵将军庙。

